

回忆椰城振强学校校长、侨总工委廖建先生

——张茂荣

上

1949年10月，我在椰城“巴中”刚从初中二年级升上三年级，有一天，班主任老师利用上语文课的时间，给全班同学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新闻。

“巴中”的前身是椰城广府、福建和客属三个华人社团，于1945年日本一投降就建立的“联合中学”，还没有自己的校舍，让学生分别在暂借的“广仁学校”、“华侨学校”和位于宛朗岸（Blandongan）的“中华女学校”三处上课。

初中一、二年级我在宛朗岸的巴中上课，母亲也在位于宛朗岸的“自强学校”执教。每天早上和母亲从Tangki的家里出发，跨过“芝里翁”河水关（Pintu air），越过“摩连弗列”东、西街（Molenvliet oosten and west，后改名为Jl. Hayam Wuruk 和Gajah Mada）进入“芒果巷”（Gg. Mangga）一路走到“庙街”（Gg. Klenteng）的“金德院”门口转到“宛朗岸”，先抵达“自强”再到“巴



廖建先生

中”。我帮母亲一路提着她批改好的大叠学生作业本，一起进入自强学校内放在母亲的办公桌上。母亲的同事看到我就会用客家话亲热地说：“啊呀，锤老师的儿子！”。我向她们鞠躬，然后走出自强到相隔不远的宛朗岸巴中。

有一天，在自强看到一位陌生的年轻男教师，母亲告诉我他是新从中国来的廖建老师，是梅州石扇人，为人很和气。他用带浓重客家口音的“国语”问我几岁？在巴中读几年级？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廖建先生，时维1948年。

自强学校是印尼“洪义顺公会”旗下的华校，公会会员和学校教

师主要是客家人，学生也多为客家子弟。自新中国成立后，华人华侨社团分裂成两派而争斗不休。原来由章勋义和徐育梅两人主持的“洪义顺公会”，也因章、徐两人政治立场日益分歧而分裂。“自强学校”的校长原为吴其峰先生，1948年吴到“巴中”任全职教师，由刘崇文先生接替，而从中国出来不久的廖建先生任教导主任。

1951年，在国际东、西方冷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华人社会两派分歧愈演愈烈，洪义顺公会亲台湾一派占领了“自强”，另一派师生被迫出走，先是借宛朗岸“巴中”的空地和教室上课，不久又搬到“加渣玛达”（Gajah Mada）大街“新明会”（Sin Ming Hoei）大厦上课，几天后又分成两部份：一部份在Tangki的“中华妇女协会”会所；另一部份在“孟加勿杀”（Mangga Besar）的“培青学校”上课。师生处于“流亡”的状态。

实际上，当时“广肇会馆”办的“广仁学校”、“华侨公会”

办的“华侨一、二、三校”等，也相继发生同样的事件，华校正经历一场大震荡！

后来，以“洪义顺公会”“大哥”之一的徐育梅先生（“梅伯”）为首的部份董事，决心找地方新建校舍以摆脱流亡的困境。幸运的是，获得当时华人办的“养生医院”（Yang Seng Ie）董事会的支持，同意将该院在“淡曼沙利”（Taman Sari）的分院让出改建成学校，条件是在该院总院后侧一块相同面积的土地上建一栋病房给该院作为交换。改建工程很快完成，从而为解决师生流亡的困境赢得了时间，已疲于奔命的流亡师生闻讯群情振奋，决心“振作图强”，就把“振强”作为校名，正式委任廖建先生为校长、黄清林先生为教导主任、徐育梅先生为校董会主席。在1952年7月13日举行成立和开学典礼，并把该日定为校庆日。振强开创之初就开办成人夜校，聘请林载诚先生为夜校部主任，以满足日占时期许多曾经失学并已进入社会迫切想进

修的一批职业青年的要求。

1952年6月，我读完高中二年级，开始放假就思考着明年毕业后的前途问题，当时多数同学打算回国升学，准备“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为了筹集回国的经费，我响应振强夜校的招聘，成为夜校的一名事务员，从此成为廖建先生的同事。我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快毕业，都在中午放学后卖报半工半读，因此感到晚上当个事务员要比在街头卖报轻松得多。没想到不久廖建校长找我谈话，要我兼任夜校新开办的初中班化学教师。他的鼓励和信任使我无法推辞，也在他的鼓励下把课讲好，获得年龄比我大的成人学员认可，从而不断提高当一名教师的信心。看到华校教师严重缺员的情况，我决定放弃回中国升学的打算，留下教书支援华校面临的教师荒，接受廖建校长的聘书，于1953年高中毕业后成为振强日、夜校的全职教师。

很欣赏廖建校长待人诚恳和平易近人，振强日夜校在他的领导之下发展迅速，教职员团结一心搞好教学工作，校风良好，振强很快成为椰城有名的华校之一，华人子弟争相报名入学。因教室紧张，日校学生分上、下午班上课。

和廖校长是亦师亦友的同事，一起工作，



位于Taman Sari的振强学校（摄于1954）初中毕业生合影（前排左7为廖建右8为徐育梅）